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

—— 口述史 ——

曲青山 吴德刚 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

—— 口述史 ——

曲青山 吴德刚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曲青山, 吴德刚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9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300-27391-4

I. ①改… II. ①曲… ②吴…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6773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口述史”书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

曲青山 吴德刚 主编

Gaige Kaifang Sishi Nian Koushu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印 张 44.25 插页 2
字 数 571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曲青山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把握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深刻洞察时代潮流、深刻体悟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旗帜，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40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篇章。

40年来，我们党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进入新时代，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推进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党始终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引领中国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40年风雨同舟、披荆斩棘、春风化雨，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再接再厉。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战略安排，这一思想是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在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老师，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改革开放40周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历史坐标和时间节点。

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向前看是为了展望未来，向后看是为了回顾历史。为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改革开放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组织编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一书。

《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紧紧围绕改革开放重要节点、重要事件、重要决策，汇集了近50位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展现了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反映了地方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的情况，介绍了各地区具有全国意义或地方特色的重大事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一国两制”、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思想性、史料性，兼具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教育性，是广大党史和文献研究者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改革开放历史，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的重要学习读物。

征集和整理重要党史资料是党中央赋予党史和文献研究部门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是研究、宣传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资料，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有力的武器。多年来，党史和文献研究部门一直重视征集和整理改革开放重要资料，特别是改革开放亲历者、见证者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许多亲历者、见证者慢慢老去，陆续离开我们，征集和整理改革开放口述资料和回忆录的工作更加紧迫。广大党史和文献研究者及热心党史和文献研究的爱好者要勇挑重担、攻坚克难，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口述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实现党和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策划编辑 郭晓明 刘荣刚 余 盛
责任编辑 孟庆晓 李俊峰 徐小玲 于 晨
马海英 贺志红 朱晓霞 陈 虹
封面设计 

目 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经过	胡福明 / 1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 波 / 13
1978 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日纪实	江培柱 / 30
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会议	梁灵光 / 35
山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刘一章 / 43
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袁宝华 / 52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宋 涛 / 68
我为“海外关系”正名上书中央	林青云 / 79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苏维民 / 84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刘田夫 / 93
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	周溪舞 / 116
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击走私工作	宿世芳 / 132
亲历宁波成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	葛洪升 / 144
回忆三年“严打”	刘复之 / 156
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	
——1983 年参与中国科学院调查组回顾	杨培青 / 165
我所亲历的《企业法》的诞生	袁宝华 / 180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王汉斌 / 207
我所亲历的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葬礼外交	黄 华 / 220

刘华清领导我军武器装备建设二三事	李安东 / 238
在日内瓦从事裁军、人权外交的回忆	范国祥 / 246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的回忆	王梦奎 / 255
浦东开发的历程	赵启正 / 271
回忆 1991 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	郭树清 / 282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	张劲夫 / 298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回顾	陈锦华 / 307
回顾 1990 年北京亚运会	伍绍祖 / 315
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 由来	唐树备 / 329
兴建三峡工程决议通过前后	成绶台 / 351
邓小平、陈云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黎虹 / 364
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回忆学习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沈达人 / 387
中国“复关”谈判亲历记	佟志广 / 397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我国两次工资制度改革历程 回顾	赵东宛 / 412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刘鸿儒 / 441
1994 年前后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刘克崧 / 455
鞍钢改革与脱困的回顾和思考	刘玠 / 482
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的作用和贡献	焦瑾璞 / 499
回顾香港回归交接仪式	王光明 / 507
见证澳门回归祖国	宗光耀 / 514
亲历九八抗洪	张基尧 / 527
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李家忠 / 546
从失利走向胜利 ——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片断回忆	龙新民 / 558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李晓南 / 575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历程	闻世震 / 589
广西百色扶贫历程	陈开枝 / 604
从国务院三峡建委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郭树言 / 620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唐家璇 / 626
中国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	李毅中 / 665
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的提出和实施	顾新宇 / 671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程	高尚全 / 688

后 记 / 69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经过

胡福明

一、认识到否定“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在南京大学批判“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我都是第一个发言。从1976年冬到1977年冬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先后发表了4篇文章：《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批判张春桥宣传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唯心论，阉割人民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此文与陆夕书同志合作）一文，论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一文，论述当代中国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一文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唯生产力论”的“唯”字，仅仅强调生产力是根本，是第一位的，与“唯物论”的“唯”字是一个意思，生产力论绝不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摘要转载）。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努力从理论上不断探索，以推动拨乱反正的进程。

南京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最早出现“造反”的学校之一，是江苏“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早在196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控诉匡亚明对我的迫害》的社论，我就被作为“匡亚明黑帮”的成员打倒，因而没有参加“造反”。

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师生强烈要求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改正，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家从亲身经历中已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我在实践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改弦易辙，重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粉碎“四人帮”，进行拨乱反正，正是推进历史转折的机会。同时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篡改与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国各方面都被搞乱了，冤假错案遍于国中，要一点一点推动拨乱反正，是十分艰难的。必须抓住一个根本问题加以解决，即找到拨乱反正的“总开关”。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反复思考，寻找答案。

我们对国情缺乏深刻了解，把极端复杂的形势看得很简单。拨乱反正的阻力太大了。先是北京传出消息，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那是毛泽东主席圈阅过的。毛泽东主席圈阅的，就不能批判。于是，这也不能批判，那也不能批判，方兴未艾的揭批“四人帮”斗争突然冷却下来。不久，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批判，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能改正，邓小平同志不能重新出来工作，冤假错案不能改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出笼后，拨乱反正寸步难行。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教学质量下降，科研无法进行，高校是个重灾区。立即有同志说：“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教育战线是重点啊。”这位同志的本意是爱护我，但也说明“两个凡是”的桎梏多么严重，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多么深广，“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使人们仍心有余悸。然而，广大群众和干部还是以各种方式推进拨乱反正。

当时流行一种方法，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找出毛泽东主席的几句话推动拨乱反正。恢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毛泽东主席的几句话做依据的。我以为，这是巧妙的办法，但用这种方法，拨乱反正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根本无法找到毛泽东主席的话作为拨乱反正的依据。我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制定的最大禁令，否定“两个凡是”正是推动拨乱反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两个凡是”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翻版，与“四人帮”编造的毛泽东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如出一辙，都宣传天才论、唯心论、形而上学，搞个人迷信。这是十分清楚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的，是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的工具。“两个凡是”的目的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阻止拨乱反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没有说过“凡是”。要拨乱反正，就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然而这很困难。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人民自然敬仰毛泽东。“谁反对毛泽东主席就打倒谁”成为最流行的口号。这样，批判“两个凡是”，可能被指责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且，“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惯例，两报一刊社论代表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观点，批判“两个凡是”会被指责为“反党”。当时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中国已经很落后了，人民政治上、精神上受压抑，生活上贫困。我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键时刻：坚持“两个凡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堕入苦难深渊；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拨乱反正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否定“两个凡是”是迟早的问题，越快愈好，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受过人民多年培养的理论教员，作为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为拨乱反正出力。

二、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文章的主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批判“两个凡是”。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行的，不能赤膊上阵。那样，即使文章写出来了，也没有哪家报刊能发表。因此要给“两个凡是”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理直气壮的，无人能反对。用什么形式批判呢？我认为，批判“两个凡是”首先是个理论问题，要从理论上分清是非，要正面立论，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先立后破。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原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这是个要动脑筋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本质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但不能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去批判“两个凡是”。

我反复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就在于，它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的正确

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永远不犯错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而且，当时人们研究解决问题、评判正确与错误不是以实践为根据，而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做标准。这就是“两个凡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主观唯心论的特征。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检验认识、理论、观点、路线、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的要害恰恰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想通这点，豁然开朗了，很兴奋。于是，我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文章的主题。

题目确定，就立即研究具体内容和提纲：先论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接着论述自然科学、理论、路线、政策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是否正确，任何人的理论、学说、观点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随后批判“句句是真理”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当时，我强调一切理论、路线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我觉得，针对性还不强，难以真正戳到“两个凡是”的痛处。因为，“两个凡是”是讲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指示是先验的、正确的，无须经过实践检验，毛泽东不犯错误；“两个凡是”并不广泛适用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一般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针对性还不强。怎么办？公开说毛泽东的理论、路线、政策也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在当时是不行的，说毛泽东也会犯错误更不行。经过苦思，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以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实践修改自己的理论观点做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认识发展也遵循人类的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特点在于自觉坚持科学态度，自觉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发展自己的理论，并公开修改某些不正确的或过时的观点。我从《“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找到了马克思、

恩格斯修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实例，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还有某些观点要依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改，何况其他著作？马克思主义导师尚且依据实践检验修正自己的观点，何况其他人？毛泽东的理论、路线、决策当然也要经受实践检验，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句句是真理”是没有的，“两个凡是”是不能成立的。我把马克思、恩格斯自觉根据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并对这一部分特别满意，认为切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1977年6月，正当紧张工作时，我家出了一件大事。我妻子在体检中发现了肿瘤，急需开刀。我着慌了，放下工作，到处奔走，联系解决妻子住院问题。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妻子住进了省工人医院。手术很顺利，接下来是陪护。那时已是暑假，白天，由儿女们给妈妈送饭菜，我则到处购买鲫鱼、母鸡，排队买西瓜。晚上，我去陪护。一间病房住4位女病人，天气闷热，陪护的人都在走廊里，找张凳子坐着打瞌睡。那时我年轻，下午睡一觉，可以通宵不眠。于是，我把中断了两周的研究在医院里继续下去。我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陆续带到医院，逐篇研读论述实践观的篇章，做出标记。这些著作过去反复读过，两三个晚上就做好了。随后，就伏在凳子上构思内容、编写提纲。累了，就找几张凳子拼起来睡一会儿，醒了再干。一星期后，妻子出院了，我的提纲也写好了。回家后，用了几天时间，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草稿。当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有一股冲动，也肯吃苦。由于这篇文章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风险，我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自己规定了几条：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正面立论；观点正确，无懈可击；态度坚决，切中要害，尽量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引用著作中的实例；以理服人，措辞谨慎，摒弃大批判作风。我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深知文字差错的可怕。因此，我必须既坚定勇敢，又坚持科学态

度。我写文章喜欢自己研究，这样敏感的题目更要独立完成，文责自负，所以文章寄出前从未与人议论过。

我历来的习惯是，文章写好后，搁几天再修改。一般要修改三四次。这篇文章更是反复修改一个来月。这期间，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也就是坚持“两个凡是”。我进一步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很适时，必须写好。

1977年8月底，文章改出来了。寄到哪里去呢？我想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是我在6月初认识的。那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

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寄出，用了近半年时间。

三、文章的修改和发表

我给王强华寄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有三部分：（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以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3）“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文章寄出4个月，没有消息。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给我